



蓝田坂的今昔

9787309071111

蓝田坂的今昔

本社編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三緯路11号)

江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一号

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书号：2384

开本：787 × 1092 1/32 · 印张：3 · 字数：35,700

1964年9月第一版

1964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,000

統一书号：T 3110·242

定 价：0.21 元

編書人的話

本書匯編了藍田、管驛前、北角三個村子的村史片斷。

解放前，這些村子，在國民黨反動派、地主、官僚的血腥統治下，農民受盡了欺凌與壓榨，過着極其苦難的生活。許多貧苦農民被逼得家破人亡，無處安生，許多貧苦農民慘死在反動派的屠刀之下。反動統治階級欠下農民的血債數也數不清；舊社會里，又何止藍田、管驛前、北角村是這樣，千千萬萬個村莊都有它自己的血淚史！

解放後，在黨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，這些村子和全國所有的村莊一樣，起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，昔日的“奴隸”，成了今天的主人，許多貧苦農民當上了國家幹部，管理國家大事。人們精神煥發，鬥志昂揚，以無比的革命熱情建設着社會主義新農村。生產成倍地增長，生活步步上升，在人民公社的康莊大道上，迎着勝利，闊步前進！

讀了這些村史，能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認識舊社會的罪惡，新社會的可愛，更加痛恨舊社會，熱愛

新社会。从而增强阶级斗争观念，提高革命警惕，充分发挥无产阶级化和战斗化的革命精神，高举毛泽东的伟大思想红旗，把革命进行到底！

一九六四年四月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蓝田坂的今昔 | 1 |
| 渔村春秋 | 42 |
| 昔日辛酸今日甜 | 69 |

藍田坂的今昔

——余江县平定公社藍田坂村史片断

藍田村史編写組

“瘟神”猖獗苦难多

藍田坂位于白塔河畔，为余江县平定公社藍田大队所在地，周围有十来个自然村。解放前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官僚的残酷压迫和剝削，劳动人民終年辛勤耕作，世世代代还是不得温飽。血吸虫病流行后，藍田景象更加凄惶。那时，各村沟沟窟窟上面，經常浮着一层过夜刷鍋水似的锈紅油漬，沾了这水，人們就要得大肚子病（血吸虫病），手脚絲軟，周身无力，終于臃脹着肚子死去。

在解放前的黑暗年代里，反动统治阶级残酷压榨，地主豪绅凶狠剥削，哪管人民死活！到了国民党手上，官匪一体，明官暗匪，“瘟神”猖獗，为害愈烈，临近解放前夕，蓝田坂只落得：大好沃野成片荒蕪，座座村庄，萧疏零落，野坟壘壘，触目皆是，破屋里沒一天断过哭声，贫苦农民脸上无一日露过笑容。

由于地主官僚的压迫，大肚子病的残害，村里很少有活到四十岁以上的人。孩子到七八岁，就要“剃弱”（初期的血吸虫病），“剃弱”上了身，就好比进了“鬼门关”，往往九死一生。

蓝田坂曾经流传着许多民谣，描述了“瘟神”盘踞下的悲惨景象。

“下田扶根棍，沒到田头就想瞓。”说的是疫病对劳动力的严重摧残。

“辮子不沾背，脸上干又黄，人在门槛里，肚皮出了房。”形容的是大肚子病患者的惨状。

“蓝田坂，大平原，草长比人高，野兽到处窜。”讲的是解放前满目荒凉，生产凋零的情况。



在反动統治下的貧苦农民，也曾自发地向“瘟神”进行过斗争，希图抵制苦难的摆布，但终究成为泡影。

这里有个“十亩坵”，座落在潘家村的門前坂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成了龙崗岭庙会的田产。这坵田，土质肥，租价低，但是誰种誰死，历来不知埋葬了多少硬汉。由于十亩坵四

只田角外伸，形状象四只老虎爪子，又因田头有口杂草丛生的水塘，狭长方正，象口棺材，因此有人叫它作“老虎田”、“棺材田”，都说它“风水不好”。提起种十亩坵，个个摇头叹息。

一九三七年，石山艾家佃农朱仔，被地主逼得无路可走，来到了人少田荒的蓝田坂。他看到十亩坵这样好的田，长满一人高的茅草，不禁动了作田人的感情，硬要种种看。可是，第二年秋天还没到，朱仔就肚子膨胀倒下去了。

一九三九年，响水桥吴家乌伢父子，不信“棺材田”的厉害，也要种种看。结果，他父子俩也先后鼓着肚子倒了下去。

吴家源的觉伢父子，潘运生的儿子，也在十亩坵葬送了性命。

十亩坵，后来便没人种，丛生芭茅荆蒿，荒蕪下来了。但是蓝田坂上的死亡并未因此稍稍停止。靠近十亩坵的大坂潘家、捲桥底刘家、董家，以及较远的青屋邓家四个村，在各种“瘟神”摧残下，变成一片瓦砾废墟，整村灭绝了。兴旺时期有过三十户、二百五十多人

口的潘家村，到解放前夕，仅剩下三户、十一人。三户勉强拚凑起三个弱劳动力，无力作田，就在门前屋后扒松土栽小粟，“有就收，无就丢”地苦挨日子。余下的张家滩、宋家、竹院、姜家、蔡家等五村，据不完全统计，解放前三年间，遭受迫害和患病死亡的就有一百八十人。传说兴旺时期曾有五百户人口的蓝田十个自然村，临近解放，只留下一百六十四家农户，而这些人家里还有二百九十八个病患者在死亡线上挣扎。

这是一笔充满血泪的数字！这是对旧社会反动政权的悲愤控诉！

为什么没有一个横行霸道、肥得出油的地主官僚、乡长保长得大肚子病？为什么“瘟神”专跟终年累断筋骨的贫苦农民作对？这完全是那个吃人的社会制度造成的。

宋洪福出生时，家里已经残破得不象样子。稍大一点，才从老祖母口里知道：爹爹兄弟六人，除爹爹外，全是染大肚子病死的。他记得：那一年，保长宋汉秀家里蒸酒，气势汹汹地进门就提走了他家的锅。爹爹当时敢怒不

敢言，保长走后却发娘的气。夜間，娘伤心得吊了頸。爹和祖母痛哭流泪，解下尸体，搁在地上，不懂事的洪仔餓得发慌，还爬到娘身上要奶吃。不多久，爹又被保长抓去当兵，一去杳无音信，撇下祖孙老小，只好沿門求乞。可怜洪仔不到十岁，就“剝弱”了，干瘦寡黄。寒冬酷暑，身上光光一层皮。沒有衣穿，更沒有被盖，破祠堂角落里，就是他們的住处。几把茅草，一床破蓆，就是鋪垫。贫雇农弟兄怜恤他俩，有心使不上力；长袍大衫的地主見他来到門槛外，老远就劈脸吐口水，叱喝恶狗咬他們。

祖母死了，洪仔大了，身体又瘦又弱。他象蓝田坂上蔓生的蓬蒿，风吹雨打，受尽摧残。在几天粒米未进、捧肚蹙眉蜷缩在破蓆上的时候，在逢年过节地主崽穿綢裹緞吃喝寻乐的时候，从他孤苦的小心灵里，不禁发出一連串的問号：为什么穷人这样穷？这样苦？为什么富人这样富？这样狠？这样的日子几时是尽头？

蓝田坂人当时还不能清楚地回答这些問

題。他們跟洪福一樣盼望着早早結束這種災難。

祖祖輩輩，人們求神拜佛，叫菩薩保佑不生大肚子病，——無用；忍受庸醫郎中重金勒索，求丹訪藥，——無效。為了治病，有的蕩盡家產，淪為地主無償的奴隸；有的被債戶追逼，不得不賣兒鬻女，割捨親生骨肉。萬般無奈，人們只好攜老帶幼棄家投奔外地。

天下烏鴉一般黑，人間地主心腸狠。窮人，逃不出藍田坂的“鬼門關”，更躲不過地主的“閻王殿”！人們在外流落了一陣，走投無路，又只得回到家鄉。

家鄉等待着他們的，還是無盡的熬煎。

血淚斑斑刻骨仇

五十年前，艾艾汝帶着前夫留下的兒子，改嫁到藍田宋家。她和宋保生雖是貧寒夫妻，感情卻很好，五年之中，連生四個兒女。但是，全凭保生一個人打長工、作客田，養家活命，日子越過越艱難。

第五个孩子出生了，他們实在无力撫養。保生只好下狠心瞞着老母，三更天動身，把嬰兒抱到邓埠，乘天不亮，留下生辰八字，用只草籃挂在人家門上。

大兒子九歲那年，上半年稻子遭了水災，下半年小粟又碰上一場黑霜。保生被迫離家到金谿謀生，艾仗帶着稍大的一兒一女，出去討飯。倆人賺到吃的，輪替送回家供養老母和一羣小的，這樣的日子過了九年。為了糊口，有一次，艾仗上午剛生小孩，下午就冒着嚴寒冰凍，給地主婆洗衣裳。他們終年勞累，一家七口，就是頂好的日子——過年過節，也只有四升米作一天飯。

保生白天黑夜打長工、作鑼匠、織布，累斷筋骨，餓斷肚腸，得了病，還瞞着家里，咬緊牙關，拚命硬撐，結果活活拖死了。保生去世，他母親生活無着，又吊頸自縊了。剩下艾仗，風里雨里，給地主喂豬、掏糞、摘粟、燒飯，凡是能作的活她都干。大風大雪，沒人僱用，她就拉着一羣孩子沿門求乞。她流盡淚水，哭爛眼窩，到頭來，還是蘿卜芋頭熬一

鍋，过着艰苦的日子。

艾艾女的苦，和蓝田坂千百个贫雇农的苦汇成一片苦水，汪洋无边。

当时的宋家村，八十多家农户，就有五十多家身负重债，三十多户失去土地，四十二人终年给地主当牛作马。还有十五户因大肚子病死去亲人的孤儿寡妇，他们跟艾艾女一样，苦撑日子。

土地呢？难道土地年年不长庄稼，长工佃农的血汗都白流了吗？

不！

土地，和贫雇农用血汗在土地上养大的庄稼，一起流到地主财东那里去了。

宋家的大地主宋华茂，就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吸血鬼。

当他二十多岁、兄弟五人分家的时候，手上只有十五、六亩田。但是不到二十年，宋华茂的土地就增加了十倍，经常雇用八、九个长工，农忙时全村穷人都得给他干活。

宋华茂怎么发的家？他杀价收米，作米生意，米里掺水，两头牟取暴利；他专在贫农难

喘气的关节上买田，巧取豪夺；还有铁板租、高利贷等等。这里单说他僱工一项。

宋华茂是有名的铁算盘。大家都说他是算盘挟在裤裆里，算着走路。僱散工，他总是不到栽禾季节，就早早下了僱工的定钱。本来农忙一工抵三工，农忙工钱他省下了。那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，贫苦农民家里几张嘴巴都等着吃，不得不睁着眼吃哑巴亏。一些农民要等栽完他的禾，才能搞自己的田，“小满栽禾呀，哪够养鸡婆”，节气晚了，产量也落空了。割禾的时候，宋华茂又动手早。散工们割完他的禾，自己的禾已老在田里。宋华茂算盘噔噔响，贫雇农不但“收了禾斜冒饭吃”，缴他的田租都不够。

在蔡家，有他的郎舅至亲、地主蔡三元。

地主蔡三元家的土地分布在各村。大儿子蔡谟作了伪少将特务头子以后，蔡三元更是猖狂。

一九四一年十月，蔡三元这老东西过六十岁生日。伪少将特务蔡谟为了给他爹抖威风，几个月前就开始筹办“庆寿盛典”，派专人到

外地採購山珍海味，載回滿滿兩船擺宴席用的杯盤碗盞；包下了全鄧埠鎮花爆店作幾月份的爆竹，還僱了幾桌吹鼓手和唱戲的，聘請了全縣和外地名廚師十七、八個，安排了開一百二十桌壽酒的闊綽奢侈的場面。

到了做壽那天，偽縣長調來五十名“自衛隊”給他站崗，一些外地的官僚士紳親自上門送禮。全村農戶連稀粥都喝不上，每戶還被迫派了四元祝壽款。據說，蔡三元家光收壽禮就發了一筆橫財，合到六十七萬五千斤谷，這些谷足夠當時貧雇農一千八百七十人吃用一年多，可給蔡家全村一百七十二人作十餘年的口糧。

他的二兒子蔡正楷，遠近農民都喊他“鈹鑼”，“鈹鑼”就是“鈹鑼槌子”的意思。這家伙凶狠殘暴，到處敲榨勒索。他當過偽鄉代表、偽保長，窩藏土匪，交結官府，借着父兄勢力，在藍田坂上橫行霸道，無惡不作。

“瘟神”統治下奄奄一息的藍田人民，哪裏經得起這些既是官僚又是土豪，既當保長又當土匪的凶神惡煞的踐踏！

他們錢多勢大，衙門開在家里，說一聲：“派伕”，貧苦農民就得被迫去當伕子；說一聲：“寫捐收稅”，貧苦農民翻轉糞罐也得掏出僅剩下的一把米！

窮人血管里的血已經流干，但這些嗜血鬼還要吸吮。

有誰算得清一年要送多少次伕子。姜家一戶中農姜應傳在一九四二年前後，上午送伕還沒回來，下午差事又派到了他家。兩年當中，他因三天兩頭當伕，幾畝田全荒了。貧農宋鳳壽，寒冬臘月當伕，一去半月，帶的干糧吃光了，還得餓着肚子送“傷兵”。臘月三十晚上，有錢人熱熱鬧鬧吃團年飯，他却在離家二十里路外的地方，一脚高一腳低，給國民黨反動派的軍隊送東西。他又飢又渴，筋疲力竭，實在一步挪不動了，要求歇歇，反遭了一頓毒打。這個三十六歲的粗壯漢子，從此一病不起。臨死叫女兒去討口剩飯暖暖肚子，飯剛端進門，他已經嚥了氣。

有誰講得清反動政府一年到底要派多少捐稅？粗粗一數就有：保學谷、積谷、優待谷、縣

仓乡仓谷、乡丁食米、解兵费、保甲费、招待费、僱兵费、擦枪费、电话费、草鞋费、慰劳捐、“自卫”捐、“救国”捐、“建设”捐、门牌税、人头税、户籍税、房屋税、养鸡税等等三十多项。到了解放前两年，反动派面临崩溃前夜，他们一进门，更是名目繁多，信口诈钱。在贫病摧残下的贫苦农民怎受得住这沉重的压榨！

看看姜家村遭受苛捐杂税盘剥的这笔帐吧！

姜家村十八户人家，有十八个男人在外头打长工；有四十多人，大年初二就得去外村讨饭。全村绝大部分人种的是地主富农的田，年年有还不清的债、付不完的息和田赋租谷，一年的苛捐杂税要派到五百多担谷！地主却一毛不拔。打了半世长工的姜季万，田无一坵，屋无片瓦，闾王簿上却登着他欠捐四十担！这是多么令人愤慨的事呵。

蓝田各村中年以上的人都还记得：那些年，太阳老高就得收工，把牛藏往邻近的大村，值钱的东西，哪怕是一斤棉花、二两棉

錢，也得藏到外面去，夜還沒到，就得赶紧关门閉戶，为的是防备官匪搶劫。白天黑夜，只要听见人叫狗叫，就得赶紧跑开，怕的是地主狗腿子、保长乡丁逼租要粮、催捐抓丁。躲吧，跑吧？但是，大地上一片黑暗，印把子掌握在他們手里，你怎么藏得了？怎么躲得过？穷苦农民牢牢地記着这笔血海深仇，盼望着抬头翻身。

長夜漫漫迎黎明

旧社会是个什么世道？为什么富人越来越富？为什么穷人越来越穷？直到有一天，紅軍的秘密工作者来到宋家，宋家的貧苦农民才懂得了这个道理。

一九三一年的一天，化妆成打散工的孙炳南同志对和明、寿生这伙穷人說：“穷人日子难过，是叫地主、国民党从根子上鬧坏的。穷人要过好日子，只有起来革命，跟他們作斗争。”老孙同志还告訴他們：“在弋阳、橫峯等地，共产党领导穷人成立了苏維埃政府，打

土豪；分田地……”老孙这些火一样的话语，使贫雇农心里燃起了希望。在孙炳南同志走后许久，宋家的长工穷汉还牢牢记着他讲的话：“你们要把宋家所有受苦受难的人联合起来，打土豪，分田地。”老孙当时还嘱咐了重要的一点：明年油菜花开时节，会有一位新同志到这里来。

一九三二年春天。

这一年，蓝田坂上的油菜长得艳绿，菜花开得金黄。

在这些日子里，宋家的穷汉见面，悄悄谈论着一件事：“那位同志该来了吧！”

一个夜晚，两百多人的宋家村，早已息了人声，唯有村东一廂土屋里燃着一盏油灯，穷裁缝宋和明、赤贫农民宋寿生和他们新近串连的长工宋银旺等三人，在灯下默默对坐，谈着同一件心事。

忽然，有人轻轻敲门：“这里有人僱长工吗？”屋里三个人侧耳静听，兴奋得心跳到口里。半晌，和明答道：“没钱僱长工。”只听门外轻声说：“那就僱散工吧！”

这正是他們日夜盼望的暗語，正是他們作夢都惦念的亲人，三个人直乐得心花怒放，連忙扑上前開門。

門外站着一個扛鋤頭背篋箕的人：“我是孫家來的，我姓熊。”接着輕言細語地敘述了自己的來歷。不等他說完，和明、壽生、銀旺就搶上前，拉住他的手臂：“你可來了！”

暖融融的陽光溶解了大地的冰凍。老熊同志象春風吹活了宋家窮人的心。他日里和長工們一道作田，夜里就向他們暢談方志敏等同志帶領紅軍鬧革命的故事。被形勢振奮、鼓舞了的宋家貧雇農愈來愈發急：紅軍什麼時候能來我們這裡？

經過老熊聯系，貧雇農派出宋和明、宋銀旺作代表，去店上周家迎接紅軍。

四月初五夜半，一支一百多人的紅軍隊伍開到了宋家。紅軍一到，貧雇農喜氣洋洋，笑逐顏開。大夥商議宰豬慰勞自己的隊伍。隨紅軍一道來的老童同志曉得了，堅決不肯。老童斬釘截鐵，再三交代：“我們是窮人的軍隊，窮人喝粥，我們也喝粥！”

紅軍來到的第二天，老童召集宋家的貧雇農開會，當場把大地主宋華茂傳來訓話。老奸巨滑的宋華茂見了這個陣勢，連忙磕頭請罪，自報承擔紅軍的全部伙食費用。老童嚴詞拒絕，只問他：“還敢不敢壓迫窮人？”宋華茂哆嗦着回答道：“再不敢，再不敢。你們要啥哩，我都給啥哩。”老童厲聲喝道：“听着，從今天起，不准要租逼債，不准苛刻長工，不然宰了你這顆狗頭。”散會時，老童又指着宋華茂說：“這顆狗頭暫寄在你脖子上，日後，窮人有個三長兩短，有你的好看！”宋華茂吓得連口的“是，是，是”。

這次會，使貧雇農揚眉吐氣，使地主階級膽戰心驚。地主知道紅軍來了再沒有他們的好日子過，恨得咬碎大牙。幾個人暗地計議，要地主宋瑞茂打發他嫁到前山艾家的女兒，到偽區公所通風報信。

初八早晨，天下着大雨，田水淹沒了路。正當煮粥的米下了鍋，外頭響起了白軍的槍聲。原來，白軍聽說宋家村來了一支紅軍，便派了一羣嘍囉趕來。這些人知道紅軍的厲害，

还没进村就开了枪，指望敲山震虎，探听个虚实。

红军迅速作好了部署。当三三两两的白军在大雨里歪歪斜斜出现在路上时，我们的机枪就“突突突”地吼起来了。这一梭子弹呼啸着从白军头上飞过，立刻吓炸了他们的狗胆。只见白军一个个屁滚尿流，抱头鼠窜，有的连枪也扔了。战斗结束，群众又严惩了几个地主。这一胜利，大大长了贫雇农的志气。

那些日子，红军天天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。贫雇农听了红军的宣传，明白了富人为什么越来越富、穷人为什么越来越穷的道理，明白了劳动人民要想翻身，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坚决进行革命斗争的道理，大家都提高了革命觉悟，明确了奋斗方向，对前途充满了信心。

后来红军负有别的任务离开了宋家。临走前，连长掏出九块光洋，交给寿生：“这是我们的伙食费。”转身又向送行的人们珍重道别。寿生热泪盈眶，拉着连长的手不放。连长不得不再三劝慰：“我们会回来的，兄弟们，

我們一定会回来的！”他向大家叮囑：“我們走了，地主、白狗子絕不会就此罢休，大家要早作打算，坚持斗争。”阶级兄弟的深情，使人们忘了雨淋，泪眼凝望着红军远行，直到完全看不见背影。和明、银旺也跟随红军走了。

红军走了，地主重新从老鼠洞里探出了头。宋华茂抖起八面威风，用“私通红匪、打了官兵、祸及诛族”的罪名，把寿生抓到县城去。

寿生被下到监狱里后，惨遭折磨。伪县政府为了逼问红军的来龙去脉，在一个来月中，使尽毒刑，踩槓子踩得寿生昏死几次。但是这条硬汉坚贞不屈，始终没有低头，没有吐露一句供词。后来，宋家的长工联名具保，几次到县城要求释放寿生，伪县长找不出证据，这才不了了之，把寿生放回村。

伪县长令宋华茂在村里高筑围墙，严加防范，又发下四条钢枪交他掌管，枪款三百二十块光洋，尽数出在贫雇农头上。但是，围墙隔不断蓝田人民对红军的渴念，钢枪吓不退蓝田

坂人民熾烈的反抗意志。

在以后的年月里，长工宋寿生把逼债的地主狠打了一顿。这条不屈的好汉，成了穷弟兄的榜样。董家长工刘东福联合穷人对付官匪，三个两个坏家伙，碰上他就吓得拔腿逃跑。这桩事曾在蓝田坂上传诵一时，大快人心。

贫雇农反压迫、反剥削的斗争层出不穷。当年红军留下的火种，在蓝田坂越燃越旺。正是：乌云染黑不了天边月，狂风吹落不下满天星。

太阳一出雪山崩

霹靂乌云一声开。一九四九年端午节前，蓝田坂上人声沸腾，红旗招展，当年的红军回来了！

红军离开蓝田十多年了，贫苦农民有千言万语要对红军讲。十多年，蓝田坂上积下千桩仇恨万宗怨，穷人血泪都熬干！

今天，红军回来了。太阳一出雪山崩，千年冰河解了冻，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，打

开枷鎖翻身站起来！

不久，党派出的工作队来到了蓝田坂。工作队干部日夜訪貧問苦，扎根串連，开大会，开小会，写标語，呼口号，向羣众宣传人民政府減租減息的政策，宣传鎮压反革命的政策，宣传土地改革法。穷人們听了，一个个笑容满面，喜气洋洋。

紧接着減租減息，貧苦农民开展了反霸斗争。穷人們把一个个地主恶霸揪了出来，控訴他們的罪恶，清算他們欠下的血債，傾吐苦水，报仇雪恨。

一九五〇年三月間，蓝田坂減租減息的声浪传到邓埠。解放前被地主逼得离乡背井、在邓埠学裁縫的蔡才初决心回家看看。这时，村农会也派人給他捎来了口信，叫他回家参加反霸斗争。

蔡才初回到家里就往农会跑。他在农会里听到許多新鮮事，感到无比兴奋，見人就說：“共产党、毛主席回来了，我們穷人终于盼到这一天了。”

这天晚上，才初在家里睡觉，忽然听得有

人輕輕扣門。打開門一看，原來是地主“鋤鐮”來了！

仇人見面，分外眼紅。才初迅速轉身摸了把菜刀，以防萬一。可是出乎他的意外，“鋤鐮”領着兒子，弓着腰，一臉討好的諂笑，假心假意地說：“才初，我和你是一家人。過去作了些對不住你的事，請你原諒。你沒米吃到我屋裏去挑，沒用的到我屋裏去拿，反正都要分掉，你先挑好的拿吧！”

才初馬上明白了，原來這個地主在耍花招，不禁滿腔怒火，大吼一聲道：“你別作夢了。你和你死去的父親、兄弟欠下窮人的血債，現在該償還了。今天是窮人的天下了，人民政府給窮人撐腰！你的東西我不要，我只要你的命！”

這幾句話象一個響雷，只見“鋤鐮”身子一顫，咬着牙，狼狽地返身走了。

不要以為陰險毒辣的地主從此就會罷休，他知道面前的才初不是一個人，而是一個強大的階級，因此千方百計地進行瘋狂的掙扎。

“鋤鐮”接着又在才初的娘舅身上下功夫。

一天，才初碰到娘舅，娘舅开口就对他說：“屋里人总是屋里人，你就不要反映‘鋤鐮’的事嘛，人家哇了好話就算了，你得点东西不就撒开？”

原来是这么回事，娘舅受了地主的騙呵！好个才初，当即把話說明：“地主恶霸还想欺压我們穷人哩！你可要提高警惕。我們要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，一定要跟地主恶霸算帐。”娘舅听了哑口无言，后悔自己上了敌人的当。

六月里，酝酿土改。才初虽然患着大肚子病，却感到自己是个頂天立地的人。有党和人民政府作靠山，和千百万受压迫的貧雇农弟兄站在一起，什么也用不着害怕！他白天下田干活，晚上开会熬夜，日夜不停，精神抖擻。他担任民兵站崗放哨的时候，紧握枪桿，眼睛朝“鋤鐮”庄院里一扫，心想：地主阶级就要完蛋啦，現在是我們劳动人民的天下。他心里不知有多高兴！

有一天，貧农蔡横初搭草皮堆，发现堆里藏着一把刺刀、一个鋼盔。他揣摩到是誰藏

的，馬上交給农会干部才初收藏起来。

誰不知道“鉞鐮”院里有枪？繳地主的枪支武器时，民兵到“鉞鐮”院里起枪，凶狠残暴的地主装得比羔羊还可怜：“人民政府的政策我知道，留着枪也沒有用，实在是沒有嘛！”

才初大喝一声：“有沒有？再想想！”

“是沒有嘛！这多年你沒在村里，哪里晓得？”

只听得“嘩啦”一声，才初把鋼盔、刺刀擲在地主面前：“看！”

“鉞鐮”脸都烏了，这才低头認罪。

汇集起来的羣众，一个个走出来，指着“鉞鐮”的鼻子，控訴他的罪恶，对他进行斗争。人民镇压了这个恶貫滿盈的大恶霸。

深受苦难的蓝田人呵，在土改斗争的革命风暴里，人人都跟才初一样，挺胸吐气，昂首屹立；人人都跟才初一样，立場坚定，奋勇向前。他們大声欢呼，庆祝土改胜利；他們笑逐顏开，分配斗争果实。貧苦农民齐声高呼：感謝共产党，感謝毛主席！

在欢庆土改斗争胜利的大会上，贫下中农们高举着红旗，敲打着锣鼓，发出了一个共同的声音：永远跟着共产党，永远跟着毛主席！

春风杨柳万千条

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压迫的大山，蓝田人民心上还盘着两块石头，血吸虫病仍然威胁着群众的健康；水，妨碍着翻身农民提高生产的意愿。

一九五二年夏天，正当早稻扬花吐穗的时节，蓝田坂上发生了严重的干旱。几十天没有落雨，人们从早到晚，在火球似的太阳底下，车水抗旱，一天也灌不到几亩田。

人民政府上半年就在狮子岩动工兴建一座工程，要引白塔河水，帮助蓝田人民改善灌溉条件。大家听说这两天可以放水，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。人们还记得，解放前夕，大恶霸地主吴良聘借名修白塔渠，大肆搜括民财，给自己在邓埠镇盖了十几间店面和一栋洋楼，而水呢？却连影子也没见。四十多岁的贫农宋金旺

边跟老伴车水，边想心事：“现在好了，人民政府为我们开渠引水，今后再也不怕干旱了。”不过，也有人怀疑：狮子岩远离蓝田十八华里，水来了，能灌几多田呢？

邓禾标两夫妻车干了朱家坂的塘，又下到塘底挖湿泥。他有大肚子病，干了一会儿便觉得腰痠背痛，爬上塘沿，想歇歇再干，突然看见前面渠道中涌来一股一尺多高的水头，捲着凉苏苏的清风，嘩嘩嘩地直流过来。

“水来了！水来了！”禾标大声叫喊，顾不得收拾家伙，就往回跑。欢喜若狂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，跳下水车，扔下锄头，一窝蜂拥到水渠两边，孩子们卜通卜通跳进水里，几辈子没见过这样的活水的老农，颤巍巍地蹲下身子捧起一捧水送到嘴里，说：“真香甜，真香甜！”

清水流进田里，低垂着的禾苗，直起腰来，卷成线的叶子，重新伸展开来。水，给庄稼灌注了生机；水，给蓝田坂带来了幸福。人们高兴得合不拢嘴，都说：“这下蓝田坂的‘风水’变了！”人们还编了首顺口溜，歌颂这件新

事：

“冲走了锈水，吐尽了苦水；喝的是清水，用的是流水；清水灌大坂，荒野变粮仓；老人眼睛光，青年心里亮；土地翻了身，人畜皆兴旺；幸福生活好，永远跟着共产党！”

有了水，种庄稼不愁了，群众生产热情特别高。这年，由竹院互助组带头，蓝田各村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，宋家、潘家、张家滩、姜家缺少耕牛农具的贫下中农，纷纷组织起来，劲头十足地迈开了前进的脚步。宋家村八户贫下中农组成的互助组，这年集体开荒，扩大了二十多亩耕地。秋收结束，粮食比单干时期增长百分之三十，单位面积产量比当时单干的富裕农民高出二十多斤，户户增加了收入。

转眼到了一九五四年，互助合作的旗帜举得更高。蓝田坂上头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成立了一年。群众看见农业社的社员齐心协力，将旱地改水田，一季变二季，闹得热火朝天，连年增产，不禁个个向往，一股劲奔社会主义。

叫人尤其高兴的是：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治

病上也显示了优越性。

上年，人民政府就派了医生到蓝田调查血吸虫病，农民头一回听说大肚子病不是“风水”，而是一种病虫作怪；更是头一回知道了大肚子病能治。可是一家一户的个体农民，“顾上吹笛，顾不上捺眼”，要是住院治疗，家里生活又照顾不上；合伙换工的互助组虽然比单干强些，力量还不雄厚。农业生产合作社



人多力量大，能夠分期分批地安排病人入院治疗！

一九五五年底，喜訊传来，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了彻底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。立刻，从四面八方伸出了支援之手。北京来了专家，省、专区和县医疗单位派来了几百名医生驻队治病，早年的郎中抬轎子請不来，来了还要杀鷄买酒；今天会打針、能动手术的医师亲自上門来了，还把药送到病人手上。墙壁刷得雪亮的医院，就設在用祠堂改的农业社的办公室的院子里，人們治病十分方便。一些枯黄干瘦的病人，治疗后，一个个紅光滿面地出院了！

得病已久的邓未标，是解放前邓家村仅剩的一戶人家。他活到二十多岁，眼見多少人得了大肚子病，药吃了上籬也沒好，早对自己的健康失去了信心。所以大伙儿去檢驗、治病，他却不大相信。有一天，他上邓埠买东西，走到街尾，发现一所大房子里，住着好多跟自己一样患大肚子病的人，他好奇地探头細看，正巧碰到一个熟人。两人攀談起来，人家告訴他这就是血防站。

“这里的医生真好呵，打针不痛，打了几针就轻松好多，护士照着也周到，吃不下饭，喂汤、喂面条，夜里还给病人盖被子！”

禾标边听边往里打量：呵，床上铺着雪白的被套、垫褥，还有毛茸茸的毯子啦！

“住院要花几多钱？”

“钱？人民政府免费治病。前几天县委书记和县长还亲自来看望我们！要不是解放，那有今天！”

经过人家劝说，禾标送了一点粪便给医院化验室，并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
直到今天，禾标还念念不忘这件事：他无心留下的粪便，血防站竟那样的重视！医院在检验了粪便以后，发现他的病情严重，但是四处找不到他的下落。血防站站长特地三下疫区调查，好不容易找到了禾标，他又不肯住院，硬说家里吃饭人多，生活困难。生产队长告诉他：社员们讨论决定，他住院期间，可以补助三分之二的工分。接着，乡长又代表政府给他送来了三十块钱救济款。禾标还在犹豫，站长已催促抬担架的人，把他抬起来了。

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党的恩情更深？比集体的关怀更亲？禾标住院期间，社里送来鸡、肉、白糖；要动手术，站长又护送他前往南昌。出院时，他身上消了肿，脸上泛出红润，体重由八十斤增加到一百零五斤，乡亲们简直认他不出啦。禾标逢人便说：“生我的是爹娘，救活我的是共产党，党的恩情永远不能忘！”

一九五六年冬天，蓝田坂上热气腾腾。土地全部入了社，私有制的界石掀掉了。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和全县支援疫区的三万民工一道，挥舞银锄，填沟埋螺，开挖新渠，彻底根除了血吸虫病，把“瘟神”送上了天。这一冬春，蓝田坂上红旗招展，歌声飞扬，千军万马，干劲冲天，一条从马岗岭蜿蜒十多里的旧港填平了，千疮百孔的沟沟洼洼清除了，荒蕪的土地重新垦出良田，白塔河水，循着密布的渠道，流进蓝田坂的各个角落。

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为余江县根除血吸虫病，特地写了两首诗：“送瘟神二首”。毛主席的伟大诗篇给余江人民、蓝田人民莫大的

关怀和鼓舞，人們激动得热泪盈眶，登着毛主席詩篇的报纸，从一双手传到另一双手，人們象看珍宝一样爭着传看。

合作化以来，还没有那一次热潮，象这样激动着蓝田各村，人們白天在田里議論，晚間在新安裝的明亮的电灯下开会，干部研究、老农座談、社員討論，各种各样的會議談論着一个中心：用什么来回答党和毛主席的关怀。村头屋壁，用鮮紅的大字，写上了毛主席的詩，田間的电綫杆上，也写上了毛主席的詩。家家戶戶請人把毛主席的詩写在紅紙上，張貼在毛主席象下。

乘毛主席的詩带来的东风，趁送走“瘟神”的胜利，在余江县委統一指揮下，蓝田坂上接着发起了一次消灭疾病、清扫一切“瘟神”的大进军。医生又下到村里，治砂眼、治寄生虫病……用旧祠堂的材料，把集体廁所建起来，帮助羣众制訂了粪便管理、水源管理和清洁卫生制度，要叫疫区从根本上改变样子，永远不受病魔的摆布！



一九五八年，藍田坂上升起了人民公社的
万道金光。“春风楊柳万千条”的局面，使藍
田人民心花怒放，他們大声歌唱道：

藍田坂上变了样，
白塔渠水閃银光，

“瘟神”送上天，
荒田献出千斤粮，
家家笑呵呵，
户户电灯亮，
儿童有书读，
老人多健康，
社会主义方向明，
三面红旗放光芒，
大家越干越有劲，
公社幸福万年长。

显示人民公社威力的头一个战役，是向低产田要粮。

公社成立以后，改造低产田的任务便被提到蓝田大队工作日程的首要位置。

一九六一年，贫瘠的蓝田坂，经过几年改造，水稻面积比解放前增加了六百多亩，单位面积产量比解放前提高了几倍。现在，党号召大办农业、大办粮食，进一步增产的门路是什么呢？从哪里下手呢？

干部和社员经过反复讨论，发现还有很大一部分低产田，有着巨大的增产潜力，夺取更大丰收的关键，看来在于实现均衡增产。低产

田的大本营，是“落雨一包脓，天晴一块铜”的白家坂。

十一月，纵横两百亩的白家坂上，搭起了草棚，电话线牵到了改造低产田的指挥所，公社、大队干部和社员们一道战斗在田坂上。每垵田的田角上都插着一块老大的牌子，上面醒目地写着这垵田第二年的增产指标。这是计划，这是决心！

那三个月，真称得起人不解甲，马不卸鞍，田塍路上，人来人往，猪牛粪和塘泥，一车车、一担担往田里送。老远红旗招展，一簇人马来了，这是孩子的送肥队伍。转眼笑语声喧，又是一簇人马来了，那是妇女送肥大军。

这一战役，使得全大队由低产变高产的面积，累进了七百亩。一九六一年全年的单位面积产量达到了八百斤！

蓝田坂再不是缺粮地区了。解放后的头几年，每年要由国家调入十多万斤口粮，现在，他们不仅自供自给有余，年年还要向国家交售七十多万斤爱国粮！

万木爭春人物新

藍田坂的人們，在黨的陽光照耀下，治愈了“瘟神”留下的創傷，蓬勃怒發地成長。

年青的共產黨員蔡興隆，曾經以他不平凡的行为，轟動了遠近各村。他一手拿鋤，一手提燈，夜夜巡行在藍田坂上。哪間牛欄門擋不住風雪，他馱禾斛頂上；哪條牛沒有照管好，關欄，他替不經心的飼養員加料、墊草。大雪鋪地，老年人出門不便，他拖着磨盤給老人平路；石橋坍塌，阻礙了交通，他動員小伙子們修橋。凡是關乎集体的事，他都要伸手去管；誰侵害公社的利益，他都要出面干涉。他的所作所為，人們講起來津津有味，听起来入神向往。

不過，蔡興隆只能代表藍田坂性格的一個側面。要完整地描寫藍田坂人的精神面貌，却要比這難得多。

竹院村二十四歲的青年張國棟，這個以往的血吸蟲病患者，一九五八年被選進空軍預校

进行基础锻炼之后，經受了千里挑一的过硬考驗，光荣地成了祖国的雄鹰。曾經是严重疫区的蓝田坂，出了一个人民空軍軍官，这要完全归功于党的培养，也是蓝田坂巨变的一个光辉标志！从张国棟身上，可以看出蓝田坂上青年一代未可限量的前程。

那么，蓝田坂的老一辈人呢？

六十三岁的余香蓮，在旧社会当童养媳受尽折磨，血吸虫病先后夺去了她的丈夫、五双儿女，流浪了大半辈子。公社化后，队里把她評为“五保”戶，讓她幸福地度过晚年，但她老人家手脚閑不住，五年如一日，精神飽滿，干劲充沛，抹粪积肥，打扫廁所，誰家有事就到誰家去帮忙。她常说：“我是享毛主席的福，作光荣事。”余婆婆当真戴上了光荣花，在消灭血吸虫病中成了模范人物，当上了县政协委员。

打了半辈子长工的姜季万，他的名字和蓝田坂的变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他的事迹，反映了蓝田坂战胜贫困連年丰收的历史进程。

蓝田坂上建立头一批互助組、头一个农业

社，他就站在最前列。

一九五三年，张家滩五户贫农、一户下中农学竹院互助组的样，组织起来搞生产，他是带头人。

栽早禾的时候，来了一批硫酸铵。有些农民当时还不完全信服，把这批白花花的肥料当作碱盐，不敢使用。姜季万头一个响应党的号召，动员组里凑了些钱，买了三十多斤，用细土拌匀，施在一丘两亩面积的田里进行试验。

现在谈起硫酸铵，人们个个欢迎，但是当初姜季万互助组的试验，却是一个大胆的举动！到夏天，两亩田的禾，茎粗、叶大、穗长，一片墨绿，人们才停止了猜测。割完禾，这坵田足足打了八担多谷，产量比全村最好的田还要高出一些。

第二年，竹院、姜家、潘家、张家滩联合成立了初级社，大家又选姜季万当社里的生产委员，他向社员提出了一个革新耕作制度的建议：把一部分旱地改成水田，下半年栽二季晚稻。蓝田坂的大部分土地祖祖辈辈缺水，不得不种豆秧粟。这时虽然有了白塔渠，水还不能

遍灌张家滩，何况下半年水又不大，大家感到信心不足。

“这里那能栽二禾？”在庙门前二亩二分地里，社员们互相争论着。看水的姜雪太硬说水路远，小水流不满田，他说：“要栽禾也行，除非捉个雷公放在这里！”

经他一說，青年人也拿不定主意。

姜季万不慌不忙地和大伙算了一笔帐：“放不到水，可以车水，下半年大部分田里不要水，水总车得到吧！田不平，能不能整平？能，重要的是目标。秧粟一亩田只收得一箩多点，栽黄禾子最少打得到两担。大家看划得来划不来？”

当年，张家滩改了十一亩旱地。清凉的水，循着新开的毛渠，流进了第一批二晚田里，仿佛流到了社员的心头。倔强的姜雪太也服了气，他找到姜季万，拍着大腿叫道：“你真看得远，早知道这水能放过来，我头一个拥护你！”

在姜季万倡导下，合作社变一季为连作，向低产田要粮，平田整地，开荒扩种，推广先

进耕作技术，闹得热火朝天。过路人看到张家滩的庄稼交口称羨。远远近近的种田人，都争着来参观“取经”。竹院社成了蓝田坂的一面红旗。公社化后，张家滩生产队又成了全省农业先进单位。

姜季万家門后经常放着一只破铁桶。这是他在旧社会辛酸经历的纪念。他早年丧父，家里一无所有，母亲带着他流落外乡，过了十几年讨饭的日子。有一回，他们沿途乞讨来到上镜，在一家铁器店門前要点冷饭来充饥，一个好心的铁匠对他母亲说：“饭我没有，要铁桶你就拿一只去吧！”就是这只铁桶，他从母亲去世一直保留到现在，桶底穿了已经换过一道，却还在珍惜地使用。

破铁桶，使他不忘记过去苦；破铁桶，使他意气风发，永远向前。

蓝田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蓝田坂的巨变是在党的领导下，从这些贫下中农和许多先进人物手上开始的。而且变化还在继续。

象姜季万一样，蓝田坂人并不满足于已得的成績，他们在党的领导下，有理想，有志

气，敢于斗争，敢于胜利，他们精心绘制着更新更美的图画，创造着更加灿烂的未来！

〔插图：陆 洋〕

漁村春秋

——波阳县鄱湖公社管驿前村村史片断

波阳《漁村春秋》编写组

美丽富饶的鄱阳湖，纵横三百余里，面积二十多万亩，水草丰盛，水性温暖，鱼类繁多，是祖国的天然鱼库；八百里湖岸沃原无边，是劳动人民开辟的富庶粮仓。

可是，在红日东升之前的黑暗年月里，这个素称“渔米之乡”的地方，只不过徒有虚名！富饶的渔场，肥沃的土壤，是人间的地狱，杀人的屠场。官僚财主作威作福，流氓恶棍横行霸道。劳动人民成年累月世世代代的血汗，填不满吸血鬼贪婪的无底洞。他们受尽了风浪折磨，嚐够了饥寒熬煎，挣扎在死亡线

上。直到一九四九年春，解放軍把紅旗插到鄱陽湖畔，勞動人民才跳出苦海，在幸福的大道上，昂首闊步，高歌猛進。

讓我們來看看鄱陽湖邊的一個漁村——管驛前，波陽縣鄱湖公社捕撈大隊的今歌昔淚吧！它將使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舊社會的罪惡和新社會的可愛。

漁民无寸水

十棵樟樹九棵空，十家漁民九家窮。當年，管驛前村里祖祖輩輩靠打魚為生的漁民，世世代代，常年累月地辛勤勞動，不論白天黑夜，也不論嚴寒酷熱，冒風雨，披霜雪，浪里鑽，水里滾，說不清扯壞了多少鈎網，踩穿了多少船底，磨破了多少血泡，流過多少汗水，結果還是落得個“螺螄蚌壳餐餐飯，千片百錢度雪天”，窮得連水都沒有一寸！

那時候，鄱陽湖水系所有的湖泊、港汊，不是被反動政府劃作“官港”，就是被漁霸資本家霸為“私港”。大大小小的港主湖霸，各

霸一方水；东有叶駝子，南有显猴子，西有高大和尚，北有李大炮，不是官僚，就是大地主，有钱有势，对渔民残暴至极！

拿叶駝子来说吧，这家伙本名叫叶芬，是驻扎在鄱阳的伪保安十四团的副团长。他手握兵权，带兵兼管港，有时住在鄱江南岸的角山前，有时住在鄱江北岸的管驿前，身边常带着一中队黄狗子给他保镖，还沿着他霸占的湖港遍设关卡。他手里经常拄着一根内藏尖刀的“文明棍”，有人不如他的意，抽出刀来就刺。他霸占的黄沙港鱼源非常厚，港租也非常重，一年要禁四次水。渔民要想进港捕鱼，逢时过节和进港前，先得去他家磕头送礼，还要受“倒三七”的港租剥削：捕到的鱼，渔民得三成，港主要得七成。缴不起租，送不起礼的渔民，别说到黄沙港去打鱼，就是从港边经过也要遭殃。

一九四一年夏天，渔民胡显松父子从官河打鱼回来，从黄沙港边经过，因为家里穷，逢时过节没有给叶駝子送礼，被港主的爪牙连船带人扣了起来，说是“破坏防钱”，把胡显松

烟在牛車輪上，打得遍体鳞伤，鼻青眼肿，口喷鲜血，还把魚全“沒收”了。漁民叶金荣有一次船过黄沙港边，叶駝子也說他“偷港”，喝令手下的爪牙把船上的魚搶了个一千二净。叶金荣又气愤，又心痛，頂撞了几句。蛮不講理的叶駝子，一言不发，拔出“文明棍”里的尖刀，朝叶金荣腿上就刺。叶金荣两腿鮮血淋淋，倒在船艙里。象这样惨无人道的事該有多少！

港主漁霸就是凭着这样的血腥手段，把河港湖汊霸为“搖錢树”、“聚宝盆”。他們一年到头把禁牌豎得高高的。只有冬季，才由港主規定日期“开港”。漁民要想去开港，預先得准备下两笔錢：港主叫人把規定开港日期的字条，送到漁民家，叫“下召子”，要付給来人“脚步錢”；开港前要事先登記，办理进港手續，又要交手續費。沒有錢，就过不了这两“关”。即使交了这两笔錢，也不能随便进港，要一字儿排在港口两边，等候港主发出开港信号。因为港主有个“四不开”的規矩：漁民来得不多不开；沒讓好港租不开；港主家有婚喪事不开；港主手下的爪牙沒到齐不开。漁



民在港边等两三天，甚至还进不了港。港租更是重得可怕，轻的“二一添作五”，重的“倒三七”，甚至“倒二八”。所以，渔民说：“打鱼一千，八百归天！”

俗话说：“种田的望割禾，打鱼的望开河。”可是，渔民们左盼右盼，好不容易盼到开港，拚死拚命地劳累一场，结果眼看着一篓篓又大又肥的鱼，倒进了港主贪婪的无底洞，自己却只剩得一点点卖都难卖的“猫鱼”（意思是鱼小人不吃，给猫吃）。有时，因为家里揭不开锅，债主逼得紧，渔民不得不铤而走险——“偷”港。倘若被港主抓到，那就“不死

也得脱层皮”。有一次，渔民邱长春去“偷”芟溪港，被港主抓到，人被打得半死，鱼被全部“没收”，船被拖上岸砸得粉碎，网被扯得稀烂。后来千托人，万托人，认罚赔礼，虽然保住了性命，却落了个残疾——被打成了駝子。那时候就是这样：有钱人明目张胆地霸、搶，是“天經地义”的；穷人想在港里暗暗的打点鱼也是不行的。所以，渔民說：“鄱阳湖里，无底（理）！无底（理）！”

剝削漁民的吸血鬼和剝削農民的吸血鬼一樣，是貪婪殘酷、手辣心黑的。他們不僅收港租、放高利貸榨取漁民的血汗，還開設“魚行”，出租船網給窮苦漁民，要漁民付高價租金，還要象農民賣青苗一樣，按行主規定把魚低價賣給魚行。

那時候，工具太差下不了大湖的，或者不願給港主漁霸累死累命的漁民，常常擠在鄱江下游一段六十里的水面上捕魚，因為這是段“官河”，水小魚少的时候，打魚是不用繳稅的，只有水漲魚多的时候，才要繳納漁民叫做“浮水錢”的“國課”。所以，管驛前漁民

說：“漁民无寸水，六十里‘官河’也要交‘浮水錢’！”尽管“官河”里平时打魚不要繳租納稅，可是連这可怜的一点点活水路，漁民也是得不到通行无阻的。反动軍警、流氓恶棍搶魚打人，敲詐勒索，并不比交租繳稅好过啊！

靠水为生的漁民会沒有一寸水？也許有人会觉得奇怪。然而，它和貧苦农民无寸土一样，是十几年前千真万确的事实！在港主漁霸的残酷压榨下，管驛前漁民穷得“船破无力补，网絮黄泥堵，鈎断打累結，网破只叫苦”，过着“蓑衣当棉袄，被褥是稻草，破碗漏鼎罐，三餐两不飽”的凄慘生活，常常是螺蛳蚌壳当飯，菱藤野菜填肚。

打魚要入帮

当年，管驛前漁民不但穷无寸水，而且連劳动求生的权利也被剥夺了，許多漁民即使忍受港主漁霸的压榨，付出昂貴的港租，也还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从事劳动。拿放鷓鳥的漁民來說吧，要打魚先得加入“刘家帮”，不入帮

就不准放鷓鴣，就沒有資格當“漁民”。

那時候，鷓鴣幫的一切大權，都操縱在房股老板劉清泉、劉冬水、劉奇善、劉金龍、劉大毛等人的手里。他們占有幫內半數以上的工具，巧設幫規，千方百計榨取漁民的血汗。迫使許多漁民無法安身立業，世世代代給幫主打長工、做牛馬。

窮苦人要想入幫當漁民，自己放鳥捕魚，就要繳納十石米，二十塊錢的入幫費，另外還要兩桌豐盛的酒席，宴請這些幫頭，方可入幫。入幫後還要受到寫港錢、官銜禮、敬神捐、訴訟費和一年三度的幫會費等種種名目的剝削。

漁民楊茂春，父親做了一輩子牛馬，自己又無償地給幫頭劉冬水干了幾年，好不容易換到了“漁民”的資格。由於一個人沒幫手，他又把沒成年的兒子帶上船來幫忙，幫頭劉冬水就規定他每年正月要請劉家幫各房股老板一桌酒。光是這每年一桌酒，就壓得楊茂春喘不過氣來。為了辦這桌酒，大年三十夜他還在外西東求西央，認高息，向漁牙人（剝皮販子）借債。連年積欠，總是無法還清。他兒子剛成

年，为了偿还父亲入帮时欠下的费用，又给帮头打了三年长工。象这样的事情鷓鴣帮里多得很，渔民許文仞的儿子为了抵偿父亲入帮时欠下的费用，给把头刘清泉打了五年长工。渔民陈新华在把头刘清泉家帮工二十多年，直到解放才翻了身。

入了帮的渔民，苦处也说不完。刘家帮一年三度的帮会，要大摆酒席，花的钱都由帮内的贫苦渔民出。而装进帮头们腰包的钱那就更多，除了规定的帮会费以外，帮头们还故意找岔子敲詐渔民。有一次，渔民楊茂春等五只船，在鄱阳湖中康山附近捕鱼。眼看帮会日期到了，为了繳納这笔费用，他们拚死拚活地干着，打算多捕些鱼，在帮会日头一天赶回村。谁知天气突然变了，鄱阳湖上起了大风。虽然风大浪狂，行船危险，可是错过了帮会日，帮头会找麻烦的。楊茂春他们顾不得危险，冒着风浪往回赶。无奈逆风逆水，船怎么也划不上前。等他们赶回来，已经迟了。帮头们大发雷霆，说他们藐视帮规，要砸船打鸟赶出帮去。后来又假装宽宏大量，说是念他们初犯，罚他

們除繳納幫會費外，另請四桌酒。

幫會把頭不僅在漁民身上零敲碎取，而且常常借事生端，想方設法，獨吞漁民的全部勞動果實。一九三八年鷓鴣幫在饒家河開港，把頭劉清泉等為了和當地土豪爭奪港權，打了一場官司。結果，漁民不但開港的魚錢分文未得，每人並加派了四塊大洋的“訴訟費”。很多人因為交不出這筆冤枉錢，被逼得過不成年，甚至連相依為命的“頭鳥”，也被劉清泉、劉冬水抓去抵了款。

一九四一年冬，鷓鴣幫四十多條漁船去開余干馬埠嘴張家港，打到一萬七千多斤魚。當地的土豪、偽保長劉應宗眼紅，說是租港只能捕一天，不肯讓鷓鴣幫再搞下去，還帶人來搶魚，抓鳥。劉清泉和劉應宗為爭奪張家港權，早就積怨在心。這時就趁機和劉應宗打官司。後來，官司陰消陽消了，劉清泉卻說開港的收入全用在打官司上面去了，一百多個漁民只落得開港三天的伙食費。漁民辛辛苦苦打來的一萬七千多斤魚，就這樣裝進了劉清泉的腰包，漁民楊茂春氣忿不過，要把頭劉清泉把帳推開

来算。刘清泉恼羞成怒，竟领着人砸了楊茂春的船，还说从此不准他撑船打鱼。

这班帮会把头上面串通官府，下头勾结流氓，一手遮天，坏事做绝，谁碰上，谁遭殃。如果有谁不入帮打鱼，落到帮头手里，不是船被砸碎，便是鸟被打死，人也要挨打坐牢。

走投无路

港主湖霸的残酷压榨，已经逼得渔民无法安生，不仅是这，还有那凶如虎狼，毒如蛇蝎的反动军警、土豪劣绅、流氓恶棍，骑在渔民头上，狐假虎威，无恶不作，渔民的苦处诉不完！

那时候，鄱阳港是个强盗窝，驻着伪鄱湖司令部、伪赣东北游击司令部、伪情报所、伪保安团、伪水警队、伪“自卫”队等形形色色的军警特务，鄱江沿岸卡哨密布。这班反动军警，挂着“保安”、“卫民”的漂亮牌子，实际上都是明夺暗抢的强盗。他们不但明目张胆地抢鱼打人、封船拉伕、敲詐勒索，而且在黑

夜里脱下“狗皮”，到鄱阳湖去抢劫渔船、客船，打劫沿岸的村庄。

平时，渔民下湖港打鱼，总是提心吊胆，唯恐碰见黄狗子。有一次，渔民王和海下湖打鱼，给黄狗子抓了军差。黄狗子逼他装着近三千斤重的十四捆军衣，压得船舷平水，一家四口差点葬身鱼腹。又有一回，王和海带着十一岁的儿子，天不亮下河，劳累了一天，打了七、八十斤鱼，父子俩撑船回家，半路上突然遇到几个黄狗子，竟然开枪逼迫王和海靠岸，抢了鱼不算，还要讹诈，说是十二人每人开了一枪，一粒子弹要打死三个日本鬼子，要王和海赔三十六个日本鬼子。王和海听了又好气，又好笑，说：“你们有枪有炮，还没有抓到半个日本佬，叫我老百姓怎么赔得出来。”黄狗子恼羞成怒，又是枪托，又是皮带，把王和海打倒在地。

反动军警的横行，又何止在河港水边呢！有时渔民侥幸弄到些鱼，想拿上街去换几个零钱用，那班黄狗子、夜狗子（警察）不是说妨碍交通，就是说有碍卫生，一脚把鱼盆子踢得

底朝天，或者把魚“沒收充公”，至少也要拿几条魚不給錢。忠厚些的吃了亏不作声；倔強些的頂撞兩句，就更耍倒霉。有一次，漁民戴清泉帶着兒子官保，提着十多斤魚上街去賣，碰上黃狗子拿了魚就走。戴清泉氣不過，大聲喊着說：“你買魚為什麼不給錢？”話音未落，就重重地挨了一個耳光。本來有一只耳朵不大方便的戴清泉，竟給黃狗子這一掌打成了牽子。

土豪劣紳、流氓惡棍一班地頭蛇對漁民的禍害，也不比反動軍警少。拿張發根、邱慶雲為首的惡棍來說吧，他們有時也划着船去“打魚”，可是不要鈎，也不用網，漁民“打攬”（一種捕撈方法），他們坐分一股。有時碰見哪個漁民放的鈎卡，還連魚帶工具一齊收走。有一次，漁民邱長義、邱太春父子，在村邊大河里放了十一萬鈎，被偽甲長的兒子、青幫頭子張細毛偷走了。邱長義又心痛、又惱恨，和人談話時提到“張細毛”三個字，張細毛知道了，就帶着一伙人掄棍舞棒，到邱長義家去鬧事。邱長義吓得用大紅石把大門頂住，從側門

逃出去躲起来，才避过了一场灾祸。

象这样“閉門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”的事，有許多漁民都碰见过。漁民张冬来的妻子有几分姿色，恶霸张細根，先是明目张胆的調戏，后来竟公然霸占了张冬来的房屋、傢物，霸占了他的妻子，把仅仅穿一条短褲的张冬来赶出了家門，张冬来的四个孩子，被张細根踢死了一个，其余三个也相繼被折磨死了。一贯善良忠厚的张冬来，就这样被这个恶棍害得家破人亡，有仇难报，有冤无处伸！

再說漁民刘义茂吧，有一次，他孩子失手将一块石子抛进了封建老板、伪閩长雷桂林的院墙。雷桂林大发肝火，气势汹汹地掀起一块大石头，向刘义茂家扔去。石头落在屋上，“嘩啦”一声，打穿屋瓦，墜进屋内，刘义茂的孩子险些被打死。伪閩长还嫌不够，又凶神恶煞地跑到刘家大門口，破口大罵：“你个婊子养的，太岁头上动土，惹到老子头上来了？我要杀你全家！”刘义茂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，挺身和伪閩长辯理。伪閩长更恼火了，冷笑一声，轉身就走。沒多时，領着几个精

枪、拿绳的家伙闯进刘家，将刘义茂抓去，反剪双手吊在梁上，还在脚上吊了两块大石头。后来，刘家倾家荡产，拿出六十块大洋，才算是保住了刘义茂一条命。

更痛苦、更凄惨的还有钟二妹一家人。她一共生了五男二女，因为穷得没法生活，忍痛卖了两个亲生子。后来，她丈夫戴老三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用机枪扫射死了，丢下四个小儿女和卧床不起的大儿子，更是挨饿受冻，衣食无着。钟二妹眼看大儿子病势一天天沉重，无奈又含着眼泪卖掉一个十岁的儿子。岂知狼心狗肺的伪保长听说钟二妹卖子得到一点钱，竟起了敲詐钱财的歹心，带着几个爪牙来抓壮丁。说是不去就要交六十块钱“顶丁”。钟二妹卖儿子也没得到六十块钱，而且还些债、买些米、抓点药，已是分文不存，现在哪里拿得出钱呢？伪保长就喝令手下的爪牙动手抓人。钟二妹苦苦哀求，邻居也帮着说好话，伪保长见实在榨不出油水，翻箱倒笼，把钟二妹一家度命的口粮也抢走了。钟二妹的大儿子经过这场横祸，病上加病，没过几天就死了。最小的儿

子因为家无糊口粮，也活活地餓死了。

在黑暗的旧社会，世上縱有千条路，穷人却是沒有一条路可走。管驛前漁民世世代代受压迫、受剝削、受欺凌，血淚斑斑的事实，說不完、数不清。可是，在那暗无天日的年代里，剝削阶级掌握了政权、军队、法庭、监狱，穷人有苦无处訴，有冤无处伸啦！

燃起斗争怒火

管驛前漁民不甘于忍受残酷的压迫和剝削，也曾不断地起来和反动军警、政权，和港主湖霸、地头蛇斗争。管驛前漁民記得最清楚的是一九四九年发生的事，那年春天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天堑，百万雄师下江南，以破竹之势解放江南的土地和人民。当时，波阳城里真是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，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，喜在心里，奔走相告，盼望解放军早日来拯救他們脱离苦海。魚肉人民的反动军警官吏、土豪劣紳，一边忙于准备逃跑，一边作垂死的挣扎。他們到处封船拉伕，敲詐勒索，

搞得波阳城内外一片乌烟瘴气。也就是在这黎明前的黑暗中，管驛前漁民燃起了熊熊的斗争烈火。

四月下旬，有一天清早，一羣黃狗子來到管驛前，對着河岸邊的漁船指手划腳，說是要封船。對於窮得“船破無力補，田絮黃泥堵”的管驛前漁民來說，漁船雖破，却是命根子呀！當時，幾個老年人連忙上前哀求說：“老总，我們這破破爛爛的船，封了去也不頂事，我們全村老小可就都要餓死呀！請高抬貴手，做做好事吧！”黃狗子越發神氣十足，連聲說不行。偽保長陳木元假裝好人，說是要漁民給“老总”送點“茶錢”：六十塊大洋。漁民雖然明白黃狗子是存心敲詐，但為了保住漁船，不得不咬着牙，忍痛答應出這筆冤枉錢。黃狗子見竹槓敲上了，說是“下午再來”就揚長而去。漁民們東湊西湊，好不容易湊齊六十塊錢的銅角子，裝了一提籃，交給偽保長。

午後，四個黃狗子果然搖搖擺擺地到管驛前來拿“茶錢”。誰知他們一看是又多又重的銅幣，嫌逃命時不好攜帶，不肯要，一口咬定

要銀元。那時正逢春水大發，鄱陽湖水滿浪狂，許多漁民因為船破網爛，下不得湖，打不到魚，窮得連湯湯水水也難喝上，那里拿得出銀洋來呢？就是那些銅板，也都是勒緊褲帶擠出來的呀！

黃狗子撈不到銀洋，頓時就變了臉，說：“誰要你的錢？我們要船！”說着，就喝叫漁民把船推下水去。漁民不理睬，黃狗子就自己跑過去推。漁民徐五仂幾個人不顧一切地撲過去，扳住船，黃狗子推不動，就掄起槍托來亂砸漁船，還要動手抓人。

漁民們滿腔怒火，再也壓抑不住啦！有些人轉身跑進村里去拿家伙。一眨眼，村里的漁民紛紛拿着尖棍、溜篙、槳柱、卡篙、馬刀向河邊涌來。一班年青人怒吼一聲：“打！”沖上去和黃狗子打起來。這一聲“打”，震蕩着每個漁民繃得緊緊的心弦，往日受黃狗子欺壓的宿怨，今天奪船的仇恨，頓時化作了一陣惊天動地的喊聲：“打呀！”

黃狗子來不及開槍，就被漁民抓住了兩個，其餘的見漁民人多勢眾，也吓得魂飛魄



散，一边朝天放枪，一边狼狈而逃。“拚着一身剮，皇帝也要拉下馬！”一个年青的漁民憤怒之下，一溜篙把一个黃狗子截下了鄱江，另一个漁民赶过去，抡起結結实实的尖棍，劈头一下，叫那个黃狗子喂魚去了。他們又把另一个被抓住的黃狗子，綁在戴旺仵家門口的柳树上，几个拿馬刀的漁民，你一刀，我一刀，剝得那个黃狗子只剩一口气，才丢下走了。

这天傍晚，三十多个黃狗子突然包围了管驛前，他們挨戶搜查，見人就抓，翻箱倒柜，見好东西就拿。漁民知道，打死了黃狗子，反动派必定不会甘休，早就紛紛逃出村去，只有

戴旺伪、邱大辮子等八、九个老年人留在村里。他們认为：“我不犯人，人不犯我，我又沒有参加‘鬧事’，躲什么？”結果，一个个被黃狗子抓了起来，押到伪保安团团部去。

路上，穷凶极恶的黃狗子，边走边打这些被抓到的漁民，戴旺伪忍不住喊了声：“冤枉！”黃狗子越发狠狠地打他，到了監獄里，还用开水燙，冷水淋他。当戴旺伪被折磨得体无完肤、奄奄一息时，憤怒地罵了一声：“狗官！”喊了一声：“冤枉！”就不再作声。黃狗子惨无人道地割掉了他的舌头，接着又割掉了他的鼻子、耳朵，挖掉了他的眼睛，将他身上綁两块大石头，抛下了鄱江。接着，黃狗子又严刑逼供，要漁民邱大辮子等說出誰是凶手，村里人躲到哪里去了。漁民們一口咬定說：“不知道！”黃狗子就把燒酒泼湿邱大辮子的胡子，点火燒。邱大辮子痛得暈死过去，其余的人也都被打得皮开肉绽，死去活来。

四月三十日晚上，黃狗子又突然包围了管驛前。反动派残杀了戴旺伪，关了几个漁民，

心里还不肯甘休。他們表面上装着沒有什么事了，等到逃出村的漁民漸漸回到村里，却來突然襲擊。當時，黃狗子帶來了大鐵錘，把河邊上的漁船全砸破了，還抬來了煤油、茅柴，準備在第二天拂曉火燒管驛前。村子四周，荷槍實彈的黃狗子布滿了崗哨，村口上用機槍封鎖了。漁民拚又拚不過、逃又逃不掉。年輕人拿起馬刀漁叉要去和黃狗子拚命。老年人，聚在一起，商量如何對付這班惡狗，村里十分緊張。

第二天拂曉，黃狗子正要点火燒村，忽然傳來消息：“解放軍從姚公渡口進了城！”姚公渡距管驛前只有五華里，說到就到。這真是晴天霹靂，吓得黃狗子魂飛天外，再也顧不得殺人放火，夾着尾巴向西逃跑了。

漁村管驛前經過血與火的洗禮，迎來了黎明！

太陽升起 換了人間

管驛前漁民永遠也忘不了，一九四九年五

月一日，胜利的紅旗，飄揚在鄱阳城的上空。那一天，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光輝照到了漁村，拯救了面临絕境的漁民。从那天起，鄱阳湖上紅旗招展，灿烂的阳光驅散了烏云。党领导漁民成立了漁民协会，进行水上民主改革。漁民在訴苦会上傾倒了千年的苦水；團結起来斗倒了港主漁霸和封建把头，鎮压了伪保安团副团长、恶霸叶駝子，革除了全部陋規。人民政府发放一批又一批的貸款和救济物資，扶助漁民发展生产，設立水产公司，取締了盘剥漁民的“漁行”。昔日港主湖霸的“奴隸”，从此成了湖港的主人，再不受压迫，再不受剝削，愉快地劳动，幸福地生活。

十五年来，管驛前漁民在党的领导下，在集体化的光明大道上飞跃前进，人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，思想觉悟大大提高。如今全村已有三十五个漁工和貧苦漁民出身的社員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鋒战士。有三十四个男女青年加入了共青团。在旧社会被剝削阶级踩在脚底下的邱太春，现在是省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，他生产积极；热爱集

体；渔工出身的刘国显，如今是大队党支部書記，县人民代表，省科学院特約研究員。



十几年来，管驛前漁民坚定不移地跟着党走社会主义道路，在风浪中看得清、站得穩、頂得住，毫不动摇，以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，战胜种种困难，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。一九六三年天旱水枯，許多湖港，干枯得現底，是漁业生产罕見的困难年景。可是困难吓不倒、挡不住組織起来的公社漁民，他們依靠集体經济的力量，組織远征队，进鄱湖，下长江，向深水进军，找魚捕、追魚捕，大搞养殖……夺取

了超历史、超计划的渔业生产大丰收。

在这里，渔民再也不信“水里求财，命里带来”的迷信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也起了显著的变化。个体生产时，“同船不同心”，现在是“同船一条心”；过去是技术保密，现在是技术公开。老渔民游培林、王和海等祖祖辈辈捕鱼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能看水色、找鱼群，捕鱼技术有独到之长，过去他们连女儿都不传，说是“留个饭碗给子孙”。现在他们说：“有了集体就有了金饭碗、银饭碗。”积极带徒弟，传本领。

现在的管驿前——鄱湖捕捞大队是一支拥有三百七十九个劳力、二百多只渔船、三百多部网具和三千四百多件钩、卡等其他渔具的捕捞专业队。社员们勤奋地劳动，发挥集体的智慧，不断地革新捕鱼工具，创造了带有方向性的“一船多具，一人多技，多具轮作”的先进捕捞方法，涨水用钩，退水用网；白天打网，夜晚放钩；普遍做到了常年作业、日夜作业，淡季不淡、旺季更旺。生产连年发展，一浪更比一浪高。一九四九年管驿前的年产量只有六十

八万三千多斤，到一九六二年鄱湖捕捞大队的年产量高达一百四十五万多斤，翻了一倍多。一九六三年他们又再接再厉，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，创造了年产一百四十六万多斤的惊人成绩！保持了历年来被评为县、省先进单位的荣誉，并出席了一九六二年华东农业先进集体代表会议。

大河水涨小河满。随着生产的连年发展，集体经济日益壮大，渔民的生活也如同鄱阳湖里起春水——步步高升，全大队二百八十八户，一千四百多人口，家家衣被皆全，有吃有余，户户存钱。村子里，栉次鳞比的渔舍，有三十多幢是新建的，其余的也经过修葺，整整齐齐，焕然一新，解放前破烂不堪的茅草棚，再也找不到踪影了。渔民占店生等二十六户，解放前终年寄居破舱，现在早已结束了水上飘泊的凄凉生活，搬进了瓦屋新居。

集体经济的发展和社员收入的增加，使得渔民在文化上也大大翻了身。渔民的子女，过去根本想不到读书，大都是当一辈子“睁眼瞎子”；现在都有了上学的机会，适龄儿童都上

了小学，有不少漁民的子女进了中学，还有两名青年去水产学院学习。社員中，知識青年正在逐年增加。去年，村里又新办了一所漁民子弟学校和一个卫生保健站。大队的俱乐部里，可以讀書、看报，可以从收音机里收听国家大事和气象消息。逢年过节，社員們还在俱乐部里排演文娱节目。一九六四年春节，他們根据本村的素材，自編独幕剧“漁家今昔”，参加全县文艺創作会演，还被評为优秀节目。

变了，管驛前和祖国土地上許許多多的城市、村庄一样，完全变了，变得叫人认不出她昔日的模样。可是，在管驛前漁民的心里，特别是在老年人的心里，却永远不会忘記管驛前悲惨的过去。吃过苦中苦，方知甜上甜。漁民高水泉的母亲、一位白发蒼蒼的老婆婆說：“現在的日子和过去比，真是从地狱里跑到天堂里来啦！”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，这是漁民的肺腑之言啊！

不忘昔日的苦难，珍惜今天的幸福，創造更加美好的未来，鄱湖捕撈大队的社員們正以冲天的革命干劲，在鄱阳湖畔，为建設社会主

义而英勇战斗，高举三面红旗，奔向光辉灿烂的里程！

〔插图：史典林〕

昔日辛酸今日甜

——乐平县观峯公社北角村村史片断

共青团乐平县委
中共观峯公社委员会

乐平县观峯公社北角村，位于乐安河下游的一个沙洲上。无论过去和现在，在镇桥地区都是远近闻名的。

说它过去有名，有两样：一是革命斗争有名，二是穷得有名。说它现在有名，是因为生产搞得好，变化大有名。这里，我们将解放前北角村人民在罪恶的旧社会里所受的剥削、摧残和蹂躏，反动统治阶级所播下的血海深仇，和解放后人民的新生，重建家园，建设新生活的历史，分几个片断叙述如下，让它时时警觉我们：牢记过去苦，珍惜今日甜。

国民党血腥殘杀 革命鮮血染全村

北角村，在一九三〇年七月曾建立过苏維埃乡政权，全村人民起来鬧革命，进行了抗捐、抗税、抗租的斗争，赶走了土豪劣紳，平分了地主的土地，烧燬了契字，革命热气騰騰。可是，在敌強我弱的情況下，为了保存革命力量，十月間紅軍調离了乐平，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，在这里施行了惨无人道的“三光”政策（烧光、杀光、搶光），向革命的人們和貧苦农民进行了恶毒的报复。

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，是“杀”字当头，残杀了革命者和劳苦人民三十多个。赤卫队员蔣維仁被国民党伪軍用馬刀劈死，赤卫队员蔣有林在敌人长針刺鼻的酷刑下而亡，全村有二十多戶全家死于非命。国民党的残杀，只能夺走革命者的生命，却动摇不了革命者的意志。当时乡苏維埃主席蔣志書，全家七口都被杀害，他在临刑时，意志昂揚，一脚踢倒了伪兵，蔑視地說：“二十年后共产党要杀你們的



头！”并高呼：“打倒国民党！”“共产党万岁！”

接着就是抢，国民党反动派到这个村子共抢了三次，一次就抢走了全村的三十多头耕牛，四十多头肥猪，六千多斤香油，穷人房屋中仅有的一点家物也被抢得一扫精光。

国民党反动派抢了以后，又放火烧燬村庄。全村一百一十三幢房屋，除地主豪绅的一

十八幢房子未烧外，其余的全部烧光，全村成了一片焦土。逼得三百多户穷苦农民无家可归，纷纷逃生他乡，过着流浪的生活。更惨的是蒋长彬的祖母，当年已七十多岁，国民党伪军把她的房子点着了，燃起了熊熊大火，刹那间，火封住了门，老人家抱起她唯一的一床棉被，想冲出门去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，一个无辜的老年人，就这样被烈火活活烧死了。

烧、杀、抢、掠之后，地主豪绅变本加厉地对返乡农民进行残酷的压榨，派捐、罚款、抓丁、抽税……动不动就把贫苦农民捉进监牢，人们愤怒以极，满怀复仇的怒火。贫农蒋立品检到了几件破傢俱，地主蒋文清硬说是偷了他的，要罚立品一百二十块光洋，并串通伪政府开了一张罚款传票，怀着深仇大恨的蒋立品，忍无可忍，他拿起一把菜刀，直奔地主蒋文清家里，厉声地说：“我人一个，命一条，你想逼死我，我叫你也活不成。”全村群众纷纷湧上。蒋文清一见势头不对，只得将传票交还了立品。北角村的人民，对阶级敌人怀有刻骨的仇恨。

“地头蛇”横行霸道 穷苦农民苦难深

在过去的黑暗年代，地主、恶霸、伪保长等“地头蛇”，倚仗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势力，对穷苦人民进行着残酷的压迫与剥削。

那时，北角村最恶的“地头蛇”要数伪保长蒋继衡，仗着他哥哥在南京做官，有权有势，他勾结各个房股的地主和封建老板，横行乡里，干尽了坏事，他曾经杀害过五个革命同志，群众叫他“天不容”。一天，渡工蒋国义正在船上吃饭，“天不容”一脚踏上渡船，气势汹汹地要国义马上给他摆渡过河去吃酒。国义心里十分恼火，回话说：“你去吃酒吃肉，我也得吃饭，吃完饭后再摆渡。”话刚落音，“天不容”拿起棍子朝国义劈头打来，打得国义当下口吐鲜血。一九四三年，正是食盐最紧张的时候，私盐卖一担谷一斤，“天不容”乘机大发横财，利用伪保长的职权，把皮硝掺在户口盐里卖给群众，吃了这盐，群众没有一个不生疥疮的，大家恨透了这条恶棍。贫农蒋

繼善、蔣來發、蔣珍魁，暗暗邀集了十個年輕小伙子，想乘夜里把“天不容”打死，沉下河去，但一直未得到机会下手，便宜了他一條狗命。地主蔣夢畢同樣是一條毒蛇，看見貧農蔣志德的妻子長得漂亮，就霸占了去，逼得志德上吊自縊。貧農蔣觀蘭、蔣元亨、蔣觀榜、蔣來發四家因窮得家里買不起柴燒，在地主蔣立運、反革命蔣立光合辦的木炭窯邊拾了幾塊丟掉不要的木炭皮，這兩個惡狗便生了一個毒計，說他們偷了木炭，強恃罰款二百四十塊銀元。逼得他們賣田賣家業。蔣來發被逼得病倒了，一年後便死去了。舊社會就是這樣：“富人橫行霸道，窮人有理難言。”

經濟剝削同樣殘酷到極點。手段毒辣，名目繁多。苛捐雜稅，多如牛毛，什麼壯丁稅、人頭稅、鍋頭稅、田畝稅、義渡捐、保學谷……還有各種各樣的宗族剝削，什麼土地會、祠堂會、祭渡會、武藝會……等等。那時，一個人頭稅一年要四塊銀元，一個鍋頭稅一年七塊銀洋，壯丁稅每戶一年八至十五塊銀元。光這三種稅，一戶貧苦農民每年就得出

三、四十块銀元。更厉害的是放高利貸、收地租、抓壯丁。高利貸輕的“加二五”，重的“对加”，租谷輕的“对半”开，重的倒“四六”开、倒“三七”开。这些手段交織在一起，逼得穷人傾家蕩产，妻离子散。貧农蔣多勤一家七口人，上无片瓦，下无寸土，全靠多勤打长工維持生活，可是长工如牛馬，自己都穿不暖，吃不飽，怎能供养全家，一家人常年是糠菜充飢。一九三六年，蔣多勤向地主蔣乃泉借了二十八块銀元，利滾利，不几年工夫就滾到了八十块，蔣多勤把破烂家业全卖光了，也还不清这笔閻王債，地主見他无法还清，竟下毒手，派乡丁把多勤抓去当兵，一去渺无音訊。他妻子带着五个小孩，无依无靠，到处討飯。一家大小餓得皮包骨，最小的一个孩子，出生才四十多天，因无奶汁哺育，活活地餓死了，其他几个孩子吃多了野菜也都病倒了，接着，大儿子也死了。最后只剩下妻子和一个儿子，孤儿寡妇，四处流浪，討飯求生。

数不清的捐、税、会、租，就象鉄箍一样把穷人紧紧箍住，使你逃脱不得。穷人只有卖

命、卖妻、卖儿、卖地、卖屋、讨饭。解放前夕，全村八百八十六亩田地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贫雇农只占了二百五十亩。全村一百五十多户贫雇农，没有房子的有一百〇七户，家破人亡的有十八户，讨饭度日的有三十六户，卖妻、卖儿的二十一户。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民歌：

有女莫嫁蒋邵湾，
喝风饮露当三餐，
上无片瓦下无地，
没吃没穿饿断肠。

这就是北角村当时的真实写照。

地主争权打械斗 穷苦农民遭祸殃

几十年前，北角与杨家两个村的封建老板为了争权夺利，洗劫财物，他们利用宗族姓氏，挑起了一场罪恶滔天的械斗。

杨家村里的杨汝霞是附近鼎鼎有名的大恶霸地主，他为了大发横财，凭着自己的背景硬、势力大，在周围强取豪夺，胡作非为，引

起了州上、屋場、张家三个村的地主不满，尤其是北角村里的地主大大不满。

楊汝霞为了霸占北角村在河东的六百余亩良田，不准北角村人在河界上經過，更不准北角村人在河中間搭桥，說什么：“河界是我的，北角村人要筑路搭桥除非把銀元从河西一个一个鋪到河东，作为买路錢。”北角村的地主蔣福万听到这話，心里想：如果被楊汝霞霸占了这条河界，河东的六百亩良田也就落到楊汝霞手里去了，这岂不是断了自己发财致富之路？因此，为了这条河界，为了河东的六百亩良田，楊汝霞与蔣福万煽动和逼迫两个村的羣众打起了一场械斗，杀死了楊家村十八个人，以后，北角村又“抵命”死去了五个人，都是穷苦的阶级兄弟。本来，楊家村指定北角村“抵命”的五个人当中，头一个就是蔣福万家的，可是，蔣福万的傣亲徐劲胡是县里的伪县官，仗着他的势力，免除了蔣福万家的头名抵命，而由一个忠誠老实、年輕力壮的貧苦农民蔣福灵頂替了。

万恶的楊汝霞，除了要北角村人抵命而

外，还讹诈了北角村所谓“和钱”十三万八千块银元，谷九万多斤。终日劳苦的穷人，本来就被地主压榨得连两餐稀粥都喝不上，那里还拿得出这笔巨款呢？穷苦的农民走投无路，只好背井离乡出外逃荒。可是，天下乌鸦一般黑，你逃得出北角村，却逃不出这“人间地狱”。贫农蒋日魁带着他的五个儿子在外逃荒，后来全家人死在外面。

以后，岁岁月月，两村经常闹纠纷，一直到解放前都不得和解。

遭水灾家破人亡 地主奸商发横财

造成北角村人民的极端贫困，除了深重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以外，还有水、旱、虫常年为灾。在反动派统治的旧社会里，人民是无法抗拒自然灾害的。这个村位于乐安河下游，是个“甑皮”地形，村庄座落在甑皮顶上，四周全是水，易涝易旱。庄稼三年两头浸，十年九无收。以前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民歌：

作田十年九无收，

有女莫嫁北角洲，
吃的是糠菜草，
住的是破草棚。

尽管人們終年賣命似的勞動，仍然是貧困不堪，農民說：“朝也忙，暮也忙，一雙空手見閻王。”

記得一九三三年，洪水暴漲，无情的洪水冲倒了房屋，淹沒了庄稼，村里男女老少被洪水逼得躲在屋樓上，叫苦連天。貧農蔣思慶，老母、妻子、兒子一家四口，逼在樓上，三天三晚沒吃一口，全家哭做一團，喊着救命，等水退后，老母和兒子餓得只剩下一口气了。

洪水退落，許多家裡的門壁都被水冲走了，庄稼被水淹得霉爛發臭，全村的貧苦農民無根柴進灶，無粒米下鍋。蔣思孝上山采野菜野菇充飢，不幸全家中毒，老婆、兒子躺在床上兩天不省人事。久而久之，連野菜也難找了。很多人被逼得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不得不拖兒帶女，離鄉背井，外出逃荒。這年金村二百二十戶人家，八百多人口，就有一百五十餘戶，六百餘人外出逃荒，歷時三個多月，其

中有二十多戶流落異鄉，沒有回來。蔣銘春的父亲給地主多年打長工累傷，被疾病折磨死了。只剩下年幼的蔣銘春與他母親，家里上無片瓦，下無插針之地，八歲的蔣銘春摠扶着滿身疾病、骨瘦如柴的母親外出討飯，母親經常暈倒在地，終於在一個炎熱的中午，再也拖不動了，餓死在山上。銘春抱着母親的屍體，哭得死去活來，一面哭喊着，一面用自己的雙手在路旁挖了一個坑，用兩把禾稈包紮母親的屍體埋葬了，從此八歲的蔣銘春就成了無依無靠的孤兒，日無三餐，夜無一宿，餓了就去討，晚上守樹兜，睡廟屋。那年頭，北角村的貧苦農民，就這樣過着風餐露宿的日子。

在這災難深重的歲月，萬惡的地主却乘機大發橫財，更加殘酷地搜括民膏。村里的地主蔣思久、蔣思祖屯着糧食，不但不借給農民一粒，而且還上門收租逼債。蔣思孝那年借了魁堡地主徐歲初、徐三毛兩家五担谷，利息對加，三、四年工夫，頭滾利、利滾頭，滾到了六十多担。由於地主威逼蔣思孝還債，蔣思孝不得不上鳴山煤礦做苦工，每年尋錢，省吃儉

用，还债还了十四年，直到解放前还欠地主十一担谷。真是：“还了利还不了脑，一世还到老。”

奸商也乘机抬高粮价。镇桥米价由原来的三块钱一担，暴涨到十元一担。到后来并规定每人只能买三升，恶毒的商人还当着农民的面将水掺在米里，再卖给农民。贫苦农民个个义愤填胸，但为了活命，又不得不买。在那剥削阶级当权的旧社会里，贫苦农民是没法安生的。

撥开烏云見太阳 人民幸福万年長

一九四九年，乐平解放了，毛主席的队伍回来了，灾难深重的北角村人民重见天日，人们怀着无比的激奋心情，迎接久别的亲人。第二年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霸斗争，接着进行了土地改革，枪决了大恶霸蒋继衡，贫苦农民从此在政治上彻底翻了身，当了家，作了主，管理国家大事。现在村里已有五十八人当上了县、区、公社、大队、生产队的干部，有二十六人加入了共产党，有三十四

人加入了共青团，有三人先后当选为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。第一生产队队长蒋金山，并被选为共青团江西省委委员，和被选为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，出席过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，两次上了北京。他多次被评为省、地、县的先进生产者，去年还出席了华东农业先进集体代表会议，在青年中树立了榜样。

党深切地关怀着北角村人民，一九五四年这里遭到了百年未有的大水灾，涝期持续了两个多月，满坂庄稼颗粒无收。这场洪水，比一九三三年的洪水大得多，涝期也长得多，但由于有党的领导和关怀，及时送来了大批救济款，运来了一船船的大米，并积极组织群众实行生产自救。全村男女老少，没有饿着一个人，没有冻倒一个人，更没有淹死一个人。而且使绝大部分农户都保持了正常年景的生活水平。全村一百五十多户贫雇农和部份中农，每户都得到了数十元或百余元的救济款。贫农蒋文钎一家便得了救济款一百六十元，可买大米一千六百多斤。蒋文钎在接到政府发给的救济

款时，激动地说：“是共产党和毛主席救了我一家人的命，救了全北角村，要是解放前碰上这样大的洪水，我们早就没命了。”

在党的指引下，北角村人民深深懂得，只有走集体化的道路，才能使广大农民彻底摆脱贫困，走向共同富裕。从一九五四年开始，这里先后组织了互助组、初级社和高级社，一九五八年公社化以后，成为观峯公社的一个大队——蒋湾大队。连年来，党领导全村的群众修筑了宽阔的防洪圩堤，开掘了纵横交错的渠道。去年，国家在这里建立了国营抽水机站，大队自己又购置了一台二十匹马力的抽水机，使全村九百三十四亩田地，除三十四亩无法自流灌溉的“天水田”外，全部实现了水利灌溉自流化。特别是一九五九年，在公社党委的支持下，北角、杨家两村的社员，通力协作，在過去曾經引起过械斗的河面上，筑起了一条三百米长的河路，中间架起了一座木桥，勾通了东西两岸，把两村社员的心紧紧联结在一起，人们把这条河路命名为“团结路”。北角村社员到河东生产从此更加方便了。依靠集体的力

量，北角村人民战胜了历年的水、旱、虫灾，生产连年获得丰收。一九四九年，全村有水田四百三十亩，粮食总产一十五万零五百斤，平均亩产三百五十斤；一九五六年高级农业社时，水田仍然是四百三十亩，粮食总产三十七万七千二百斤，平均亩产八百七十七斤；公社化后，产量连年增长，一九六三年，虽然遭到四季大旱，五百六十四亩水田，总产粮食达六十二万八千五百六十六斤，平均亩产一千一百一十四斤，比一九五六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九，比解放前增长两倍多。棉花和油脂也都获得大幅度的增产，特别是蒋金山生产队，去年粮食亩产达到一千一百七十斤，皮棉亩产一百三十二斤，光荣地出席了全省农业先进单位、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。

生产的发展，经济的繁荣，促进了人民生活的共同上升，家家户户吃得饱、穿得暖，许多过去连见都没见过的用品现在也有了。撇开这些不说，单讲居住一项，解放前全村二百二十户贫苦农民住茅房二十三幢，破烂的瓦房五十三幢，没屋住的一百零七户。解放后不但分

到了房屋，而且新建了三十幢新瓦房，修建了五十一幢房屋。貧农蔣信善，过去上无片瓦，下无寸土，沒吃沒穿，全家三口，过着牛馬不如的生活。解放后，一家七口，做了一幢新楼房，衣物用品，样样都有。八岁就成了孤儿的雇农蔣銘春，現在也成家立业，做了新屋。

文化也大大地普及和提高了，过去北角村的貧苦农民沒有一个識字的，如今，村里有了高中生，初中生，二百多名小学生，村里还办起了俱乐部，有各种各样的圖書，組織了学习小组，还組織了歌詠队，业余剧团，修建了球場，每天，社員在劳动之余，看書的看書，打球的打球，唱歌的唱歌，文化生活十分活跃。

想想过去，看看現在，社員无不激动地說：“今昔对比，一个天堂，一个地獄。”

北角村人民是在苦水中泡大的，是在斗争中成长的，他們牢牢記着旧社会的深仇大恨，十分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。他們深知，过去之所以苦，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和剝削阶级統治所造成的；今天之所以甜，是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結果。他們热爱党，热爱毛主席，

热爱公社，热爱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。党指向哪里，就奔向哪里。他们保持与发扬了党的光荣的革命传统，艰苦奋斗，奋发图强，以顽强的革命精神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。他们改造了一坵又一坵的低产田，开掘了一条又一条的渠道。去年，秋旱十分严重，洪家场的十五亩边远田，无水灌溉，社员们顶着烈日，用十三



部水車接起来，盘过一里多路的山岗，从水库里把水車过来。由于干旱过久，有不少的稻田断了水源，河水干得只剩下中間“一条綫”，抽水机也无能为力。在党支部的领导下，社員們劈开山坡，开沟挖渠，苦战了三天三夜，开了一条三里长的水沟，终于把河中心的水引了上来。那些日子，北角村的社員吃在車旁，睡在車旁，一直坚持到底，抗住了旱災，夺取了丰收。去冬，雨水連綿，气候寒冷，社員們顶着刺骨寒风，冒着牛毛细雨，下到齐膝深的泥塘里，挑塘泥积肥。社員們說得好：“搞生产就是干革命，生产搞好了，支援了国家建設，才是对革命尽了力量，做出了贡献。”北角村人民更有着可貴的共产主义风格，蔣金山生产队三改两讓低产田、讓肥讓水的故事，广为人們传誦。这个队曾先后两次把亲手开垦出来的，經過三、四年改造的年产約五万斤粮食的几十亩湖田和十一亩旱地，讓給了兄弟队；去年，他們又把座落在洪家塆的十五亩七分三厘的边远低产田，要了过来，加以改造，获得亩产七百三十五斤，比头年增产将近一倍。在秋

旱十分严重的情况下，蔣金山生产队情愿抬水車到三錢湖里去車那些小窟里的水，而把水庫里的水讓給了兄弟队，一九六三年他們队里得到獎勵化肥一万一千多斤，本来，这些化肥，还不能完全满足本队的需要，但为了大家都能增产，他們拿出了八千斤化肥支援兄弟队，自己只留下三千斤。兄弟队感动地說：“这是讓粮，不是讓肥。”他們却說：“干革命就要顧全大局，不能一花独艷，要万紫千紅。”

随着生产的发展，北角村人民对国家建設的支援也越来越大了。北角村是个粮食定銷地区，往年国家每年要供应口粮十六万斤，去年全村只要国家供应口粮三万斤。其他棉、油、生猪項項超額完成任务，棉花送售了四万七千九百斤（子棉），超額百分之四十八点二；油脂送售了五千六百四十四斤，超額百分之二十一点八；生猪送售了六十五头，超額百分之十二。蔣金山队超額更大，各項都超过了两倍多，还卖了一万斤光荣粮。今年，北角村提出了更高的增产指标，决心夺取粮食亩产一千二百斤，皮棉亩产一百二十斤，为国家做出更大

的贡献。他们表示：永远听党和毛主席的话，
坚定不移地把共产主义红旗撑到最高峰。

〔插图：陆 洋〕

